



# 開啓現代中國研究的視野： 談「魯迅、周作人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研讀會

彭明偉\*



魯迅和周作人兄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對日後的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魯迅小說、雜文代表新文學運動的最高成就，而周作人所提出「人的文學」的主張成爲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思想革命的核心。

## 一、緣起

大約十多年前，我在清華中文研究所就讀時和幾位喜愛文學的同學籌辦

\* 國立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2008-），著有《五四時期周氏兄弟的翻譯文學之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論文，2007年）、《韓少功小說研究》（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1年）。

讀書會，一開始挑選幾部厚重的西方小說名著來讀，固定進行幾回後沒料到大家的興致仍頗為高昂，絲毫沒有倦怠，於是我們繼續規劃下一個專題，沒想到參加人數不減反增，讀書會就這樣接二連三運作發展下來。十多年來，老同學陸續畢業離校，新同學前仆後繼加入，儘管大家來來去去，但總能維持一個鬆散而又有凝聚力的讀書團體，大家定期聚會所追求的不過是一種單純的讀書之樂，算是對研究所正課的彌補。

我個人畢業後開始在交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服務，在忙碌緊張的教書和研究工作之餘，我也思索如何使這來之不易且有多年基礎的讀書團體能繼續成長茁壯。正為此苦惱之際，我恰好看到國科會人文中心徵求「人文學專家研讀會」的公告。我認為鼓勵籌辦讀書會這構想立意良好且眼光弘大，確實有助於拓展當前台灣人文學術界的視野，長遠來看更有助於凝聚跨領域的人才而形成基礎扎實的研究團隊。於是我便和幾位朋友商量，獲得大家一致贊同後，便由我擬定「魯迅、周作人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研讀會計劃向人文中心提出申請。

這個讀書會以魯迅、周作人兄弟這兩位現代中國傑出的思想先驅為中心，希望能夠先就他們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深具影響力的著作深入探討，使得讀書會成員能在短期內掌握中國二十世紀的思想文化議題的雛形。同時，我也希望能夠藉此讀書會凝聚相關領域的學者和研究生的力量，進一步開拓研究中國現代文學與思想的風氣——我以為當前台灣人文學界亟需投入人力和資源加強對現代、當代中國文學與思想的研究，而魯迅研究與周作人研究正是必要的基礎。若是缺乏這個研究基礎和學術視野，兩岸文學的比較研究乃至東亞思想研究將難以充分開展。

## 二、舉辦經過

「魯迅、周作人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研讀會計劃正式獲得人文中心的大力支持後，由我本人負責主持，並請計劃助理協助聯繫協調各成員聚會時間、預訂聚會場地、複印發送討論材料等事務性工作。我們從民國 98 年 10 月開始按照原訂讀書計劃陸續展開活動，於 99 年 4 月底結束，在半年之內進行十次讀書會。為了不枉費許多成員遠道而來，我們每次主動將聚會討論時間延長至三個鐘頭左右。

每次聚會由專人負責導讀，首先報告主要討論議題，接著成員們發言或



提問，彼此不分大小先後隨意而談，充分展開交流與討論。由於不少讀書會成員初次接觸魯迅和周作人作品，起初他們對於閱讀材料吸收消化的狀況不如預期，因而略感挫折。爲此我略爲彈性調整，減少每次的閱讀份量，以便所有參加成員較能掌握魯迅、周作人的作品精髓，在聚會討論時焦點更明確，以產生更好的思想激盪效果。此外，我們也積極邀請海外專家學者來演講，如目前在交通大學客座講學的上海師範大學薛毅教授是大陸中生代著名的魯迅專家和現代文學專家，他曾爲本讀書會進行專題演講，分析魯迅作品中以深奧難讀著稱的散文詩集《野草》。他也多次抽空與讀會成員一起用餐座談，爲我們補充大陸魯迅研究史的知識，並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

在此，我順便簡略談談這次讀書會在實際執行上遭遇到聚會次數頻繁、時間不易協調的困難。由於參加讀書會的教師和研究生分散在台南、彰化、新竹、桃園、台北等各地，往往較不容易協調共同聚會討論的時間。初出茅廬的年輕教師肩負沉重的教學工作和研究升等及家庭生活的壓力，而碩博士研究生則多半正埋首準備撰寫畢業論文，想抽身參加讀書會首先得排除萬難，接著往返舟車勞頓也耗費不少時間精力。這些實際的困難明顯地影響讀書會成員參與的興致，因而我認爲若能減少讀書會召開頻率，比較理想的方式大約每三週進行一次，一期八次左右爲宜，如此讀書會成員的負擔能夠減少，也較能專注參與聚會討論活動。

### 三、場地選擇

此次讀書會由跨校的教師與碩博士研究生所共同參與組成，大部分成員分散在台灣南北各地任教或求學。爲了減少成員們往返交通耗費的時間精力，讀書會的場地主要安排在位居南北交通要衝的新竹交通大學。首先，新竹位居台灣南北往來交通的中間位置，各種交通便利，高鐵、台鐵及公路車班頻繁，可將所有的成員往返各校所需耗費的時間控制在五個鐘頭以內。其次，我本人在交大通識中心任教，享有地利之便，能夠順利租借場地的事宜，也能較爲妥善應付臨時突發狀況。我們聚會場地主要在交大通識中心的小型會議室，這個會議室可容納約二十人，具有良好的多媒體影音設備，而且空間不致過大，可拉近成員間彼此的距離，便於營造一種輕鬆活潑而親切的討論交流氣氛，避免落入過於嚴肅而僵化的互動模式。我以爲讀書會之所以爲讀書會正是以這一點和正式課程區別開來。

#### 四、參與人員

本讀書會由跨校際、跨領域的師生所組成，成員皆為近年國內外培養的文史專業領域的博士或研究生，受過良好的學術訓練。成員們的主要專業為中國現代文學、台灣文學領域，另外包含專精日本近代思想史的學者或文化研究領域的師生。在台灣文學方面，有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徐秀慧及就讀淡江大學中文系博士班的黃琪椿，他們對台灣日據時代以來的文學及兩岸文學比較研究方面都小有名氣；在中國現代文學方面，有成功大學中文系蘇敏逸及我本人，在中國現代文學、當代文學、魯迅研究、周作人研究等方面涉獵較深；在日本近代思想史方面，有剛從日本東京大學畢業、在交大通識中心任教的藍弘岳，他是目前台灣少數專精日本江戶思想史的學者，協助我們解決諸多魯迅、周作人與近代日本文化的問題。此外，幾位參加討論的研究生大半著手撰寫現代文學方面的畢業論文，內容包括魯迅、周作人及蕭紅或台灣文學等。我原本也邀請一位任教於交大的人類學者，希望能借重他的專業協助我們解釋周作人著作中大量關於婦女運動、宗教儀式、民俗文化等議題的篇章，可惜他因故未能參加聚會。另有幾位成員因為家庭因素而無法出席每次聚會，這是讓人略感遺憾的。

#### 五、現況與後續

由於魯迅、周作人畢生的著作相當龐雜，本讀書會研讀的範圍先以1920年前後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為主，時間斷限大致為1917年至1925年左右。讀書會計劃的進度大致依照魯迅、周作人作品發表的時間先後，並參照當時幾個重大的思想文化議題有系統地細讀與討論，以確實掌握兩人的思想特點，並可產生相互參照詮釋的效果。此外，以同時期其他作家為參照，如胡適、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比較周氏兄弟兩人與其他作家的思想之異同。我們討論的著作主要有《魯迅全集》中的《墳》、《熱風》、《華蓋集》等雜文集，散文集《朝華夕拾》、《野草》及書信集等；《周作人自編文集》中《藝術與生活》、《自己的園地》、《談龍集》、《談虎集（上、下）》等評論集、散文集，並參考他晚年所作的自傳《知堂回想錄》。我們也討論《胡適全集》與《獨秀文存》中的相關部分。讀書會舉行多次下來，我感覺這些著作牽涉的歷史文化層面較廣，原先對魯迅、周作人著作較為陌生的成員難免感到不易深入掌握，未來每次讀書會討論範圍應該適度縮小、集中主題。



自 1920 年代中後期起，中國的無產階級工人運動和左翼運動思潮已顯露蓬勃發展的跡象，加上北伐革命成功後，中國社會整體局勢產生急遽變化，周氏兄弟的思想也隨之明顯轉變，因而可歸為另一階段文學思想的發展。本讀書會是一個長期讀書會的開端，也是一個重要的基礎，未來我們將在這基礎上提出另一研讀會計畫，接續研讀 1920 年代中後期魯迅、周作人及瞿秋白、馮雪峰等相關重要作家的著作，探討周氏兄弟的思想產生何種變化，如何由同盟合作而逐漸走向歧路，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因應中國左翼革命的時代潮流。未來我們也將籌辦以周氏兄弟為主題的小型研討會，藉此集中展現讀書會成員們個人近期的讀書心得或研究成果。

## 六、成果精華

本讀書會的成員原先對於魯迅、周作人作品的認識深淺不一，經過半年來一系列的細讀與討論，已較能夠具體而深入掌握這兩位影響現代中國文化至深的作家思想，也較能掌握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文化發展所面臨的重大議題。此外，藉由大陸學者演講座談，成員得以面對面與他們親身交流，除了掌握最新的研究趨勢，也能具體感受毛時代結束後當代中國的學術傳統。

研讀會最實質的成果，我認為是讀書會成員的思想成長或新視野的開拓，以下略談我個人感受較深的兩點。

首先，先前與讀書會成員們無關的魯迅、周作人，「別人的」魯迅、「別人的」周作人，在半年來一系列的聚會討論後逐漸轉變為「我的」魯迅、「我的」周作人。從成員們所提交的相關論文或讀書報告來看，魯迅、周作人已經進入成員們的研究視野，並能與自己當前所關注的研究議題相結合。換句話說，魯迅、周作人不只是抽象的理論體系，而是成為認識現代中國的窗口，並能在成員個人思想中形成具體的參照。

其次，透過魯迅、周作人以弱小為本位的政治文化觀點，讀書會成員們發覺了自己的「勢利眼」。魯迅、周作人的文學思想是以同情弱小、反抗壓迫為核心，他們站在強者、壓迫者的對立面為無聲的同胞、弱小的民族而著書立說。這種視野成為讀書會成員重新認識東亞和乃至近代東西方世界的契機，發現在強權的國際世界之外還有別的世界。

就此而言，本讀書會除了有助於促進當前台灣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之發展，也能與當前盛行的台灣文學研究產生相互參照的作用，並能反省西



魯迅紹興故居

1911年，31歲的魯迅在這裡寫出了第一篇小說《懷舊》。臥室裡陳列著的鐵犁木床是當年魯迅的原物。

方中心主義的流弊，從而真正開拓更為宏大的國際視野。

在這篇文章結束前，我想略為談談魯迅、周作人作品的時代與典範意義。魯迅和周作人兄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對日後的中國現代文學與文化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周氏兄弟雙峰並峙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至抗日戰爭前夕都是中國文化界的領袖人物或是文化論爭的主角。當年魯迅小說、雜文代表新文學運動的最高成就，而周作人所提出「人的文學」的主張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思想革命的核心。在1920年前後，周氏兄弟藉由評論、創作和翻譯等多方面的作品大力促進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不僅啟發了當年無數的青年，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樹立起劃時代的里程碑。

二十世紀以來，魯迅是中國最具影響力的作家與思想家，迄今這文化英雄的地位雖然偶或遭到質疑而成為話題，但仍是無可取代的。周作人早年是博學儒雅的大學者、英姿颯爽的流氓加紳士，但因抗戰時期與日本帝國主義者合作而淪為漢奸，迄今留下難以洗刷的臭名。兩兄弟的人生境遇形成了鮮明對照，也反映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複雜面向。

當前兩岸的政治經貿交流日趨熱絡，為追求兩岸歷史文化的相互理解，對於當代中國文化的研究成為日益重要的課題。我們若要探究當代中國大陸的歷史文化問題，必須追本溯源到1920年代前後魯迅、周作人這一代人所面臨的文化困境與深刻的反省思索。魯迅研究、周作人研究構成了現代中國文學與思想研究的兩塊基石，相較於中國大陸、日本、韓國在這領域長年經營所累積的成果，台灣人文學界亟需開拓現代中國的研究視野。這個契機促使我們正視自我的困境、反省自我的褊狹，從而在學術文化上抬頭挺胸邁向真正的國際。